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高爾基《母親》中的聖經引語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Wang, Zhigeng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7-05 21:30:33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99

高尔基《母亲》中的圣经引语*

王志耕

内容提要:高尔基作为20世纪俄罗斯革命文学的代表作家,其创作亦与俄罗斯传统的基督教文化密切相关。考察其早期革命文学代表作《母亲》的叙事形态,可以发现其中对圣经文本的直接引用,集中体现在对弥赛亚观念的引用,由此将传统文化的神圣叙事转化为现实社会的革命叙事。

关键词:高尔基;《母亲》;圣经;基督;引语

The Biblical Quotes in Gorky's *Mother*

Wang Zhigeng

Abstract: Gorky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writers in the 20th century but his writings are both deep rooted and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tradition of the Russian Christianity. The narrative of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masterpiece *Mother* adopts the direct quotations from the Bible

* 此文为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宗教文化语境下的苏联文学”(批准号 AS1108)研究成果。

and the view of Messiah so that the novel shows the shift from the traditional religious narrative to the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for the need of the social reality.

Key words: Gorky; Mother; the Bible; Jesus Christ; quotations

直到今天,高尔基仍是争议最多的作家之一。作为20世纪俄罗斯革命文学的奠基人,以及苏联作协的最高领导人,他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帜。但同时也有人认为,他是最完美地继承了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的作家,尤其在发扬俄罗斯宗教文化传统方面,他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看上去,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在我看来,这两者并不矛盾。不错,高尔基创立了新世纪革命文学的样板,但同时,他也将俄罗斯传统精神以隐性方式带进了这种新型文学样式。使革命文学文本与作为俄罗斯宗教文化传统文本标志的圣经形成了“引语”关系,而这种引语最鲜明地体现在其奠基性作品《母亲》中。

一

高尔基始终是一个基督教显性传统的否定者,但这并不能使他自身割断与那种宗教文化的内在血脉关系。

众所周知,在创作《母亲》时期,高尔基的思想正处于“造神论”阶段。在世纪之交,革命与宗教两种意识形态的交锋十分激烈,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首的革命派主张通过暴力革命解决俄国问题,而师从霍米亚科夫及索洛维约夫的一批宗教哲学家,开始建构他们的新基督教学说——“寻神论”(богоискательство)。寻神派试图引导民众寻找到新的基督,创立一种基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新精神秩序,从拯救人的灵魂开始拯救俄国。在他们看

来,革命并没有给人民的生活带来改善,反而造成了社会精神秩序的崩溃,只有精神的复兴才能拯救灵魂,进而拯救社会。尽管寻神派成员的观点、方法都有较大差异,但其共同之处仍是在基督教基础上寻求出路。寻神派理论从一开始就遭到左派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抨击。在革命前夜,列宁必须对任何可能危害革命的“精神”逃避行为加以阻遏,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问题在于,寻神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符码在新时期的一种延续性表达。而文化符码无论在任何语境下都会以或显或隐的形式建构着新的意识形态幻象。不仅在反对革命的学说中是如此,在革命的学说中也同样如此。这也就是卢那察尔斯基和高尔基等人所主张的“造神论”(бого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出现的背景。宗教思想家赫克谈到这段历史时说:“自1905年大革命失败后,一般人更逃入宗教,更想找出一个由智力方面说来比较满意的宗教。在这时候,甚至于有些马克思主义者都支持不住了,都往宗教跑,都向教会投降。这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布尔加科夫、别尔加耶夫。还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行动者,如卢那察尔斯基和高尔基,都想把宗教和革命的目标联合起来。于是他们变成了‘上帝制造者’,因为他们不愿意复归于旧日那模糊的正教,但想造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宗教,可以保存宗教的价值,而不需接收教会的信条。”^①用苏联学者的话说,就是“如果说寻神论是与反动阶级密切相关的话,那么造神论则是发生于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内部”。^②这也说明,俄罗斯宗教文化的延续不是通过主观背弃即可中止的。

高尔基同托尔斯泰的宗教观十分相近,即都否定机构化教

① 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高骅、杨缤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93页。

② М.Ласковая Богоискательство и бого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прежде и теперь. М.,1972,ст. 8.

会和基督教教义教条,但却肯定耶稣的历史意义,认可基督的思想具有提升人类精神品格的意义。高尔基在图解“造神论”的小说《忏悔》(1908)中,通过主人公马特维的悲惨境遇对传统教义中的上帝提出强烈质疑。既然上帝是万能的,为什么善良人总是遭难?其实这是个永恒的诘难,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站在神正论的立场来回答这一提问的,但高尔基则直接否定了上帝的万能及存在:“上帝的尊容在我心目中已经蒙上厚厚的灰尘,我本想擦去时光给它抹上的污垢,可结果却把上帝从我心里彻底擦掉了,我的心由于恐惧而颤抖起来。”^①高尔基通过马特维的精神探索而否定了上帝,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立场是无神论的。所谓造神不过是否弃传统教义的上帝,然而他却要另外造出一个上帝来,尽管他把那个上帝命名为“民众”(народ)。小说通过约纳神甫这一形象表达了作者的造神论思想:“平民百姓就是造神者!世上无数的民众!比起教堂里所有的正教徒来,他们才是伟大的殉难者,他们才是上帝!显灵吧!民众是不朽的,我信仰他们的精神,我相信他们的力量;他们是唯一的、不容置疑的生活基础;他们是过去和未来的一切上帝之父!”(431)也就是说,传统的上帝虽然被否定,一个新的上帝出现了,尽管它的表达符号发生了变化,其实质仍是宗教性的。或者说,在这篇小说中存在着一文化规定性与现实规定性的对话:从现实规定性出发,高尔基试图否弃传统意义上的教会与上帝——这是他自觉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归属;而文化规定性却制约着他无法在否弃教会的同时建立一个纯粹世俗的目标,他排除了外在的上帝,却无法排除心中的上帝。

但抽象的“民众”仍难以为民众自己所理解,所以,高尔基还是无法逃离圣经传统所规定的套话约束,“耶稣基督”成为他最方

^① 高尔基:《忏悔》,孙静云译,见《高尔基文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26页。以下引文均据此译本,页码标于引文后括号内。

便的引语格式。在《忏悔》中他也借约纳神甫之口说：历史上权力的拥有者“歪曲了耶稣的精神实质，叛离了耶稣的教义，因为耶稣是活生生的，耶稣反对他们，反对人对人的统治！”(430)即使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高尔基早已抛弃造神论思想的时候，他仍然肯定基督的正义性。他谴责当时一个打着基督旗号反犹的组织时说：“基督本人，还有他的近身使徒，不都是犹太人吗，他难道不是为了不分彼此的每个人、为了所有种族的人去受难，去接受痛苦的死亡吗？”俄历1917年圣诞节(公历1918年1月6日)他在《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称：“今天是基督的诞辰，基督是人基于对正义与美好的追求而创造出来的两个伟大象征之一。基督是仁慈与人性的不朽理念，普罗米修斯是众神之敌，是第一个面对命运的反叛者——人类再没有创造出任何比这两个表达自己意愿的化身更伟大的事物了。”^①

其实不唯高尔基一人，整个苏联时期的文学，无论它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结构中如何夸张变形，都逃不掉传统文化符码的制约。别尔加耶夫甚至认为整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基督教文化的某些理念是内在相通的。他说：“俄国的共产主义较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更具有传统性，它就是古老的俄罗斯弥赛亚观念的变体与改造。”^②在这个意义上说，苏联时期的革命文学文本其实也与传统文化文本形成“引语”关系。

巴赫金认为，任何文学话语都是“引语”，都是对他者话语的“引用”。这些引语基本上分成两大类型：一种是对他者话语价值的继承与再现，一种是对他者话语价值的评判与颠覆。前者可称作“线形风格”引语，也可称为“直接引语”(прямая речь)，后者可

① Горький М. Несвоевременные мысли, МСП: Интерконтакт, 1990, с. 179, 105.

② Бердяев Н.А.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М.: Наука, 1990, с.152.

称为“描述风格”引语,也可称为“间接引语”(косвенная речь)。^①在巴赫金看来,直接引语多见于古代文献,而自西欧的近代以来,则具有颠覆意义的间接引语成为主流。但是在我看来,恰恰是在20世纪的苏联时期,文学话语对基督教传统文化文本——圣经——的直接引语现象成了主导倾向,它甚至最集中地体现在革命文学,或曰红色经典的叙事结构之中。这内在地说明了未经世俗化冲击的俄罗斯宗教文化的强大力量。而高尔基的《母亲》正是这种引语文本的奠基性作品。

二

《母亲》对圣经的引语形式可以从多方面分析,首要的是对“弥赛亚观念”的引用。

弥赛亚观念(мессианизм)在俄罗斯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传统的俄罗斯大国理念中,拯救世界成为其固有的使命。早在16世纪,著名修道士菲洛费依在给瓦西里三世的信中便称:“仁慈的沙皇,你的强国将看到,所有信奉正统基督教的王国都已汇聚为你的王国:只有你是普天之下基督教的沙皇。……两个罗马败落了,但第三个却站立着,而且将不会再有第四个。”^②当时俄国刚刚摆脱蒙古人的桎梏,便有如此的“使命”意识,可见这一观念之根深蒂固。甚至在许多俄罗斯思想家的心目中,包括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人,都认为俄罗斯民族与“弥赛亚观念”是天然融合的。这种思想被特鲁别茨科依称为“民族弥赛亚观念”(национал-

① 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征铨译,见《巴赫金全集》第二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72-473页。

② См. Памятник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Конец XV - середина XVI века. Сост. и общая ред. Дмитриева Л. А. и Лихачева Д. С.. М.: Худож. лит., 1984, с. 441.

ьный мессианизм),他认为,在新的时代,俄罗斯民族应该放弃狭隘的民族意识,而与其他民族一起承担起完成上帝伟大事业的使命。^①这一思想在革命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诠释。但无论是民族弥赛亚观念,还是宇宙弥赛亚观念,都赋予了革命文学以救赎叙事的形态。

“弥赛亚”的希伯来原文意为“受膏者”,指为上帝拣选肩负拯救使命者,在基督教形成时期,人们相信,上帝将通过一位弥赛亚推翻罗马政权,建立上帝之国。《死海古卷》中记载了与艾赛尼派相关的一个宗教社团的生活(施洗约翰即属于此派),他们相信弥赛亚将以四个具体的形象出现——新先知、新教师、大祭司、国王,并将领导以色列人开始新的纪元。耶稣就是早期基督教观念中弥赛亚的“先驱”。在东正教观念中弥赛亚则成为全人类的“救主”。可见,弥赛亚观念直接涉及拯救者形象,他是神圣的,是上帝旨意的执行者,但他的位格却是人,生于尘世又死于尘世。因此,在尘世的人身上寻找神性,给人以救赎的希望,便成为弥赛亚观念的想象基础。

从基本的价值叙事而言,《母亲》承袭了耶稣救世的主旨。在小说中,基督作为一种象征性符号反复出现,使得小说叙事带有了强烈的圣经引语暗示意味。主人公巴威尔在开始他的革命活动之初,便自觉地以耶稣为榜样。当有人提议创立一种新的信仰以替代旧的上帝时,巴威尔的第一反应是:“喂——不是已经有一个耶稣了吗!”^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巴威尔投身革命正如使徒追随耶稣一样,都是为一个与人民同在的伟大目标而献身。所以,这个以前的酒鬼开始变得温文尔雅起来,甚至拿回家一幅画挂起

① Трубецкой Е. Н. Старый и новы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мессианизм //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2, с.256.

② 高尔基:《母亲》,南凯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63页。以下引文均据此译本,页码标于引文后括号内。

来,那幅画正是表现基督复活后的情景。这让母亲对儿子的行为感到不解:“信基督,可又不去教堂……”(13)。这在显性层面上仍是高尔基造神思想的体现,即,基督就在人们心中。在他看来,基督已是内在于民众灵魂中的形象,他的精神只须重现,而无须再造。为了强化这一观念,小说中作为民众代表的母亲言必称基督,就在她认识到儿子活动的革命性质之后,仍然相信,这一事业等同于耶稣的事业。她对尚不能理解巴威尔等人行为的人群说:“这些孩子们,我们的亲骨肉,在世界上为真理而行动起来……为了大家!为了你们大家,为了你们的后代,他们为自己选定了一条走向十字架的道路……去追求光明的日子。他们希望有另一种生活,真理和正义的生活……他们希望大家都能幸福!”(192)“我们的孩子们在世界上向着快乐的生活迈进——为了大家,为了基督的真理,去反抗那些家伙用来迷惑我们、捆住我们、绞杀我们的一切东西。”(193)如果说这时的母亲仍然是在凭着习惯来称基督的名,但在她逐渐成为一个理智的革命者之后,她对基督的体认便具有更为明晰的特点:

她祷告的次数不知不觉地日益减少,可是,却越来越多地想到耶稣,想到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提起耶稣的名字,好像连耶稣都不知道。但是,母亲觉得,他们却遵照耶稣的箴言生活着,并且和耶稣一样,也认为世界是穷人的天下,希望把世上的全部财富平分给一切人们。……她觉得,她一向用模糊的热情——恐惧与希望、感动与悲伤紧密交织的复杂感情热爱着的耶稣,现在和她更加亲近,和以前不一样了——变得更高尚、更具体、更乐观、更英明了。人们为耶稣甘洒热血,却谦逊地不肯喊出耶稣这个受苦受难的人类之友的名字,而耶稣仿佛受了人们热血的洗礼,起死回生,真的复活了。(254)

由此可见,虽然小说通过母亲的思想演变否定了传统基督教的上帝,但却在价值叙事的层面上引用了耶稣文本的原初立意。

三

正是基于这一引用原则,在《母亲》中,巴威尔顺理成章地成为弥赛亚形象——耶稣基督——的直接“引语”符号。所谓“直接”引用,是对被引用套语的各功能项的直接肯定,并在此基础上以新的能指符号,或曰幻象,进行再造的引用。在弥赛亚原型的功能项中存在着几个关键元素,如肉身与神性(指使者)的统一、怀疑者、告密者、追随者、受难(复活)。而这些功能项都在巴威尔身上得以重现。

基督二性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道成肉身”,上帝的神性通过耶稣的肉身显现给世人,从而实现其拯救功能。所以,耶稣通过圣母马利亚而具有肉身,并成长于恶劣的环境中,遭群氓误解,甚至他在拿撒勒的乡亲也认为他有行骗之嫌;遭希律王追逼,与同为犹太人的法利赛教派形成严重对立,这种对立成为他最后受难的一部分。这就是耶稣的肉身性。在《母亲》中,巴威尔最初的身份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矿工,他的父亲一辈子过着卑微苦难的生活,上工、酗酒、打老婆儿子,这就是他一生的事务。而在父亲死后,巴威尔也走上了父亲的老路,他喝醉了酒,模仿着父亲的口吻向母亲吼道:“把晚饭端来!”(9)虽然小说只描写了这一个情节,但已成为“耶稣肉身”的功能项表征。他参加了革命组织,但面对的是成千上万像父亲那样愚昧的大众,他组织工人学习革命文献、在“沼地戈比”事件中号召罢工等行为,都受到工人人们的怀疑与抵触。但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他必须体现出应有的神性,即如派耶稣到世上来的“父”,要有坚定的信念与超乎常人的勇气、毅力等。巴威尔从父亲状态转化到新的生命

形态是一个奇迹,他突然就变成一个让母亲无法理解、但又绝不是当年父亲那样的人物,无论遭遇什么样的挫折,巴威尔从无退缩,最后还走向受难、牺牲。这一切都是因为“神性”的在场,也就是说,他的神圣异能的体现都是因为他并非孤军奋战,他从属于一种先验不败的神圣力量。在叙事结构上,巴威尔与耶稣都有一个全能的“指使者”,在后者是“差我来的父”,在前者,则是“党”。我们来看小说中在这个问题上对巴威尔的表述是怎样对耶稣话语进行直接引用的:

《约翰福音》8:28-29:“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作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作他所喜悦的事。”

《约翰福音》16:32-33:“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母亲》(法庭上):“我是一个党员,只承认党的审判,我现在讲话,并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按照我那些同样拒绝辩护的同志们的愿望——试试向你们说明一些你们所不懂的问题。检察官把我们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举行的游行说成是——反对政府的暴动,始终把我们看作是反对沙皇的暴徒。我必须声明,在我们看来,专制制度并不是束缚我们国家的唯一锁链,它只是我们必须从人民身上最先打碎的第一条锁链。”(376)

所以,小说通过对巴威尔背后的“指使者”存在的暗示,赋予了这个形象以特殊的神圣性。

耶稣的思想被大众接受有一个艰难的过程,巴威尔也如此。不但普通民众会怀疑他,甚至他的同伙中也存在着怀疑者。小说

专门塑造了农民革命者雷宾形象,来完成这一功能项的任务。雷宾主张革命,不仅否定传统教义中的上帝,也对耶稣的公正与坚定提出质疑,这使他成为与巴威尔目标相同但却抱有怀疑态度的形象。他不相信那些“大人先生”们所编写的书本,只相信实际行动。他最终独自一人到农村鼓动民众,最后被捕牺牲。耶稣的门徒多马便是这样的怀疑者。多马在耶稣受难前追随他,但在耶稣的门徒中唯有他不相信耶稣可以复活,只有当他亲手触摸到耶稣肋间被钉的疤痕时,才相信这是他的主。所以,“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20:25—29)雷宾在小说中所扮演的正是这样的角色,这非常明显地从他戏称自己为“多马”中可以看出(155)。显然,雷宾这样自称暗示了此前有人给了他“多马”的命名。总之,怀疑者功能项的意义在于,说明了主人公行为的神秘性、危险性与崇高性。

在耶稣传道原型中必不可少的功能项是告密者,在圣经故事中“犹大”这一人物的原型意义是无可置疑的。《母亲》显然没有忽视对这类形象的设置,依萨·高尔博夫在情节的整体关系中所起到的便是犹大的作用。虽然他没有像犹大那样直接成为主人公的告密者,但其形象的存在成功地使传道者行动的秘密性质更加增强。依萨的犹大身份不仅从他成了沙皇当局的暗探可以见出,而且从巴威尔对他被杀的态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耶稣明知犹大出卖了自己,但对他未施加任何惩罚,犹大因此悔恨交加,自缢身亡。在小说中,当霍霍尔表示谁像犹大一样为了金钱出卖别人就该杀时,巴威尔却对有人杀死依萨表示了厌恶,这种表现也体现出耶稣对犹大的宽容。巴威尔虽然没有死于依萨的告密,但告密者的存在已经预示了他最终受难的必然性。

当然,正如耶稣拥有坚定的门徒与他同甘共苦一样,巴威尔身边也有着许多追随者,并且大多是在他的感召之下逐渐成长起来的。而母亲形象在这一关系中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耶稣受难

后使徒的作用。耶稣受难后,其使徒彼得、大小雅各及保罗等,周游各地传布耶稣的教义,建立教会,成为真正普及基督教义的创始人,并相继为此殉难。母亲自从参加了巴威尔的事业,便成为其最为忠贞的支持者;在巴威尔被捕之后,她则肩负起传播革命真理的坚定不移的使命,儿子的精神在她身上得到了延续。这一传道者与使徒的关系从她的话中表露无遗:“要是人们不为基督去赴死,也就不会有基督了!”(182)

巴威尔最终受难,正如耶稣走上十字架,以自己的肉身之死为世人赎罪,并警醒世人自我救赎。巴威尔亦以自身的成长向民众显示了人如何从罪孽走向神圣。圣经的救赎观表明,这个世界既存在着绝对意志的“必然性”,同时也存在着造物自由的“相对性”,而必然性将最终引导造物的自由走向与绝对意志的契合。如东正教学家谢·布尔加科夫所说:“对世界的最终创造来说,需要巩固这样两种基础——上帝的万能和被上帝之爱牢牢守护的造物的自由,并因此而使上帝的创造与人的创造最终统一为一种牢不可破的、完整的创造。”^①巴威尔形象的现实功能也就在这一点,他由具有相对自由创造力的普通人,把他的创造性用于向着某个神圣目标的努力,从而与必然性达于一致,揭示出复活在“我”心中的救赎真谛。

英国学者杰弗雷·霍斯金在谈到苏联时期的革命文学时指出:“这些新型小说试图在已经公式化的和官僚主义化的文学形式中,通过恢复青年的活力、自我牺牲、忠诚和‘革命浪漫主义’,使这些神话获得再生。”^②而《母亲》正是这类文学的首倡者。它通过对圣经文本的直接引用,将传统文化中潜在的神圣套语,借助

① Булгаков С. Свет Невечерний. Созерцания и умозрения,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4, с. 352.

② 杰弗雷·霍斯金:《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浦立民等译,见薛君智编选《欧美学者论苏联文学》,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51页。

于激烈与艰辛的革命生活使之复活,将传统文化的神圣叙事转化为现实社会的革命叙事,从而使可能成为暴力话语代言者的革命文学具有了隐喻的复义性特征,也相应地获得一种新的艺术表达模式。

作者王志耕,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俄罗斯宗教文化(东正教、圣愚现象)与俄罗斯文学经典的关系,近期论文有《俄罗斯文学的经典品格——虚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愚》等。